



The Nature and Criticism Criteria of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Tang Zhesheng

Abstract: The “New” of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for vernacular is used instead of wenyan (classical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which made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come into the vision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f so,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clarified because it used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criticized object or “countercurr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irst,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is the focus. The title of popular literature is historical and conventional, and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is the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iterary aesthetic function ar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in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new era,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itizen consciousness and mass media are embodied. Second, what a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and May 4th New Literature? The May 4th New Literature adheres to enlightenment consciousness and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so does popular literature.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from each other. The “people” enlightened by popular literature are not the “people”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s in ancient China, nor the “peo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emocracy during the New Literature period, but the “national people” with modern consciousness. Though the vernacular writing of popular literature still stays in the simple spoken language level, its authors are indeed the pioneers of China’s vernacular writing. Third, how to view marketability and entertainment tendency of popular literature? Marketability and entertainment a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r literature. Although marketability brings complexity to popular literature, it can promote the writing and operat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although entertainment tendency brings superficiality to popular literature, it is still the basic feature of popular literature, and it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excellent popular literary works to think about ideology with the usage of entertainment. Fourth, criticism criteria of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should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literature, different criteria are used, which is the basis to make literary criticism effective and applicabl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ppraise the Chinese popular works is good or not in the view of mass culture, media operation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inking of culture, social and life deeply in accordance with creation rules of popular literature, but not claim it with the methods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which required by elegant literature.

Keywords: popular literature; theoretical problems; feature;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Author: Tang Zhesheng obtained Ph.D. i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became professor there in 1997, and now is the professor in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a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director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Soochow University. In addition, he is vice director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Martial Heroes, and vice director of Chinese Research Society of Zhang Henshui Studies.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mass cul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s well as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History of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Reflections of Moder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Comments on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性質與批評標準

湯哲聲



[摘要]“漢語新文學”的“新”，是指有別於中國傳統的文言文、以漢語白話為坐標系的“新”史學觀念，這就使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得以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視野，並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於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在過去是作為被批判的對象、作為文學史的“逆流”存在於各類文學史中，所以有些理論問題需要澄清。一是現代通俗文學的概念和內涵如何理解。通俗文學的命名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的約定俗成。中國現代通俗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學在新時期的延續。傳統文學的特點表現在傳統文化的底色和傳統文學美學形態的承接，新時期通俗文學的特點表現在國家意識、市民意識和大眾媒體的影響。二是現

代通俗文學與“五四”新文學是什麼關係。“五四”新文學所秉持的啓蒙意識和白話文學，通俗文學也同樣具有，祇不過它們之間有所區別。通俗文學所啓蒙的“民”，不是中國古代的“君之民”，也不同于新文學的“人之民”，而是具有現代意義的“國之民”。通俗文學的白話創作還停留在說活的淺顯上，但作者是中國白話創作的先行者。應該將晚清興起的現代通俗文學與“五四”時期興起的新文學看成一個整體，它們一起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期；它們之間的區別是，現代通俗文學的興起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初級階段，“五四”新文學的興起是現代文學發生的高級階段。三是如何看待通俗文學的市場性和娛樂化。市場性和娛樂化是通俗文學的基本性質。市場化會給通俗文學帶來雜亂，卻是通俗文學創作與運作的動力；娛樂化會給通俗文學帶來淺薄，卻是通俗文學的基本特徵。運用娛樂性進行思想社會思考，是優秀的通俗文學作品的特徵。四是現代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應該有自己的特色。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應該用不同的批評標準衡量，這是文學批評能夠適用、有效的基本出發點。評判通俗文學作品的優劣好壞，應當是用大眾文化的視野、媒體運作的眼光、通俗文學美學特徵來衡量，應當是依據通俗文學的創作規律對文化、社會、人生進行深入思考，而不是用高雅文學所要求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來要求之。

[關鍵詞]通俗文學 理論問題 特徵 辨析

[作者簡介]湯哲聲，1997年在蘇州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被評為教授；現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代通俗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會長、張恨水研究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大眾文化與通俗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流變史》、《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思辨錄》、《中國當代通俗小說史論》、《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講論》等。

“漢語新文學”的“新”，不是以往文學史強調的“新文學”的“新”，而是指有別於中國傳統的古文、以漢語白話為坐標系的“新”史學觀念；中國現代通俗文學也因此得以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視野，並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經歷了1980年代的作家作品研究、1990年代的文學史研究之後，邁入21世紀，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又開始了它在文學史中理論地位的研究，其速度和深度是三十多年前無法想像的。之前它是作為被批判的對象、作為文學史的“逆流”存在於各類文學史中，現在不僅獲得了“正名”，還開始討論它的文學史地位，這是“漢語新文學”史學觀念的重要貢獻。既然是探討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史學地位，一些理論問題就開始浮現，而廓清這些理論問題又恰恰是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如何進入學科史的前提。從這樣的視角和目的出發，本文試對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學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 “現代通俗文學”的概念和內涵如何理解？

當今學術界一講到通俗文學，一些人總喜歡把它與輕鬆、消閑、趣味性等同起來，認為通俗文學就是輕鬆、消閑、趣味性文學。原因在於，這些論者是將當下中國的流行文學的感觀移植到現代通俗文學的批評之中了，並沒有真正弄懂現代通俗文學的概念和內涵。

在1917年新文學登上文壇之前，現代通俗文學並沒有特殊的名稱，就叫中國文學。新文學登上文壇之後，為了取得正宗的地位，開始對前階段的文學展開批判，稱它們為“鴛鴦蝴蝶派”。根據現有資料，這個名稱最早是周作人（1885—1967）於1918年在批評中國文學作品時舉例中稱呼的：“此外還有《玉梨魂》派的鴛鴦蝴蝶體、《聊齋》派的某者生體，那就更古舊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現代的空氣以外，且可不必論也。”^①之後“鴛鴦蝴蝶派”就成為了現代通俗文學最早的命名。在以後的文章論述中，雖然很多人就以“鴛鴦蝴蝶派”稱呼現代通俗文學，例如阿英（1900—1977），但總的來說名稱是五花八門——茅盾（1896—1981）稱它們是“舊文藝”或者“封建主義舊文藝”（如《封建的小市民文藝》），魯迅（1881—1936）稱它們是“佳人才子書”（如《上海文藝之一瞥》），張恨水（1895—1967）稱之為“章回小說體”（如《總答謝》），范煙橋（1894—1967）稱之為“民國舊派小說”（如《民國舊派小說史略》）。“通俗文學”的名稱出現得比較遲，是1942年通俗文學作家在上海開展“通俗文學運動”時給自己起的名稱。他們稱新文學是西洋派，舊文學是古典派，認為自己要打破壁壘將新舊文學都歸置於“通俗文學”的體制中。^②1980年代，蘇州大學范伯群教授帶領的學術團隊對這些文學作品開展研究，最早也是命名它們為“鴛鴦蝴蝶—禮拜六派”（如范伯群《禮拜六的蝴蝶夢》），後來開始文學史寫作的時候，纔正式稱呼它們為“通俗文學”。

從現代通俗文學命名的過程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通俗文學不止是“通俗文學”一個名稱，它還有很多名稱；二是不管現代通俗文學名稱如何多，也不管這個名稱如何亂，它是從中國傳統文學延續而來，是中國傳統文學在新時期的表現，祇不過是用“通俗文學”的名稱稱呼之。

說它是傳統的文學，主要是指它的文化價值判斷的傳統性。與新文學追求人性價值、個性價值等人道主義觀念不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是以中國道德文化作為是非判斷的價值標準。在民族和國家觀念上，它有很強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因為這是中國傳統道德中的“大節”。在家庭觀念和個人行為上，它要求忠孝和規範，因為這是中國傳統道德中的“小節”。以“大節”為例，自晚清以來，中華民族一直處於被欺侮的狀態中，國家一直處於被肢解的危險中，但直接描述這些生活的新文學作品並不多，真正寫民族問題、國家問題的文學是現代通俗文學。梁啟超（1873—1929）等人的政治小說是對國家未來強盛的暢想，是“國家暢想小說”；李伯元（1867—1906）等人的譴責小說是國家暢想之後的失落，是恨鐵不成鋼的憤怒，是“國

①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出版公司，1935），第292—293頁。

② 陳蝶衣：“通俗文學運動”，《萬象》4（1942）：130—141；5（1942）：124—127。

家譴責小說”；進入民國以後，民族和國家的災難更為深重，1915年日本與德國在中國青島開戰，以《禮拜六》為陣地的中國作家們開始了“國難小說”的寫作。“國難小說”的寫作一直延續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王鈍根（1888—1951）的《國恥錄》、周瘦鵑（1895—1968）的《亡國奴家的燕子》、包天笑（1876—1973）的《滄州道上》、程瞻廬（1879—1943）的《不可思議》等作品最具代表性；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張恨水寫了《大江東去》、《虎賁萬歲》等大量的“抗戰小說”，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寫抗戰題材最多的作家。^①從梁啟超的“國家暢想小說”到張恨水的“抗戰小說”，無論側重點如何不同，民族至上、國家為重都是絕對的價值標準。這樣的文化價值判斷在當下通俗文學中同樣延續，1990年代以來的“域外小說”、“歷史小說”、“官場反腐小說”在“大節”問題上毫不含糊，一直是判斷事件對錯、臧否人物優劣的標準。再如，現代通俗文學作家對“小節”也看得很重，認為道德問題是做人的根基。從這個視角出發，他們強調人要講究“孝道”，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他們反對新文學所宣揚的講孝道就是扼殺人性的論點，更是嘲笑新文學中那些“衝破家庭”的描述。他們寫晚清官場的腐敗、袁世凱的稱帝、軍閥的混戰以及當代社會中的一些醜陋現象均是從做人的角度出發，寫這些人背後骯髒的私生活，告訴讀者這些人道德如何地敗壞，“做人”都做不好又怎麼能治理國家呢？雖然不斷地受到各種文化的影響，以中國傳統價值觀念作為文化標準是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核心內涵。從這個角度出發，說中國通俗文學最具“中國特色”並不為過。

當然，它畢竟是發生在新的時期，新的文化環境一定會對它產生影響。這些新的文化環境決定了通俗文學的“現代”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市民階層的迅速壯大成為現代通俗文學的主要創作主體和閱讀層面。進入現代中國，社會變革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是都市社會的迅速形成。快速壯大的市民階層為通俗文學培養了作者、提供了素材，也保證了穩定的讀者。由於這些市民都是由鄉民轉變而來，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仍是他們的價值觀念；又由於他們進入商品社會，利益的追逐、慾望的滿足、時尚的消費逐步成為了他們的生活態度。中國特色的市民性質，直接決定了中國特色的通俗文學性質。說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就是中國現代市民文學也可以成立。（2）大眾媒體的運用。中國現代文學十分重視大眾媒體，但通俗文學尤甚。從最初的報刊，到後來的電影、電視，再到當下的網絡，現代通俗文學幾乎是與大眾媒體交織在一起同步發展的。這種狀態形成的原因，一是中國大眾媒體幾乎是與市民階層同時崛起壯大，二是科舉制度的廢止給傳統的中國讀書人提供了成為第一代媒體人的機會，三是大眾媒體的大眾訴求與通俗文學爭取更大讀者群的目的相一致。大眾媒體的性質，影響了通俗文學的創作機制、審美內涵和閱讀態度。（3）開放的創作思維。追求市場利益最大化，使得通俗文學具有開放的創作思維。它能夠感悟到什麼是讀者喜歡看的東西，並且很快地將其吸收進來。現代社會給通俗文學的開放性思維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它不僅能夠吸收所謂“高雅文學”的營養，還能吸收外國文學的營養。“鴛鴦蝴蝶派”除了繼承明清小說的模式之外，林紓（1852—1924）等人的翻譯作品對它的影響力不可小覷。張恨水小說之所以被稱為趕上“新時代”^②，主要是接受當時大為盛行的新小說的影響；當下中國通俗小說之所以被認為有很強的當代性，就是這些小說之中夾雜着很多當下世界的流行文化。

總之，輕鬆、消閑、趣味性祇是通俗文學的美學特徵之一，不能代表更不能代替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性質。如果以1917年1月胡適（1891—1962）的《文學改良芻議》為中國新文學登上文壇的標誌，那麼，在1917年以前發表在報刊上的小說均應該是現代通俗小說，因為它們均是中國傳統小說在新時期的延續。這些現代通俗小說既包括梁啟超等人的“政治小說”，也包括李伯元

① 張恨水的“抗戰小說”有兩個意義應特別強調，一是他將訴說民族和國家苦難的“國難小說”提升到寫民族和國家奮戰的“抗戰小說”；二是他寫的“抗戰小說”主要是寫正面戰場的抗日。

② 張恨水：“我的創作與生活”，《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上冊，第254頁。

等人的“四大譴責小說”，還包括蘇曼殊（1884—1918）、林紓、陸士諤（1878—1944）等人的傷感小說、社會小說、理想小說。它們的存在祇是說明，晚清以來的中國通俗小說豐富多彩。同樣，在茅盾接編《小說月報》之前，中國文學期刊祇是通俗文學期刊——既包括《禮拜六》，也包括稍前的《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新新小說》、《中外小說林》等。現代通俗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學的延續，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此過程不受什麼古代、近代、現代、當代的斷代史影響。其實，將文學史實橫向地強行分代，祇是便於總結歷史和課堂授課，很不適合縱向發展的文學史實；如果再用橫向斷代史的思維論定縱向發展的文學史實的性質，那就祇能是主觀強加，結論必然是謬誤百出。

二 現代通俗文學與“五四”新文學是什麼關係？

“五四”新文學有很多特徵，但核心價值祇有兩個，一個是高舉“民主”“科學”大旗的啓蒙主義，一個是要求以白話進行文學創作，即胡適所說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①要討論現代通俗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關係，就必須從這兩個核心價值的視角出發。

現代通俗文學有沒有啓蒙，回答是肯定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興起於1892—1902年，標誌性事件有這樣幾個：1892年韓邦慶（1856—1894）的《海上花列傳》最初連載於《海上奇書》上；1897年嚴復（1854—1921）、夏曾佑（1863—1924）發表《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1902年《新小說》創刊；1902年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這幾件事說明：（1）一個具有詩文傳統的國家開始重視具有大眾色彩的小說創作，並且以小說創作作為“新國民”的手段；（2）小說創作告別“說史”和“傳奇”，開始注重“今社會”的描述；（3）小說創作不再是個人創作、私人刻印散發的個人行爲，進入了利用大眾媒體印刷傳播的大眾時代。這些方面都表明，中國文學創作開始與中國古代文學切割開來。正因為具有這樣的意義，這一時期的文學改革被稱爲“晚清文學革命”。如果結合這個時期嚴復寫的《論世變之亟》、《原強》等論著，梁啟超寫的《中國積弱溯源論》、《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自由書》、《新民說》等論著，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是想教育中國國民成爲具有“自由意識”、“主人意識”、“國家意識”的“新國民”；他們所宣揚的“民”，不是中國古代的“君之民”，而是具有現代意義的“國之民”。如果再延伸到小說描述來看，這個時期的小說無論是什麼題材，都貫穿着“新民”的思想。例如，蘇曼殊是最早將雨果（V. Hugo, 1802—1885）的《悲慘世界》引進到中國的人，就在他的譯作《悲慘世界》中竟然出現了這樣的話：

那支那的風俗，極其野蠻，人人花費許多銀錢，焚化許多香紙，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薩。更有可笑的的事，他們女子，將那天生的一雙好腳，用白布裹起來，尖促促的好像那豬蹄子一樣，連路都不能走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呢？^②

這分明是蘇曼殊要借雨果之口嘲笑中國敬菩薩、裹小腳來“新塑”中國之民。他們不僅要啓蒙中國國民成爲“新國民”，還宣揚一些“新科學”。小說與理論文章不一樣，小說中的很多科學思想都具體化了。例如，什麼是電光時速（吳趸人《新石頭記》），什麼是飛機（陸士諤《新野叟曝言》、包天笑《鴨之飛行術》），什麼是高樓、汽車、水泥（陳冷《新西遊記》），甚至還描述什麼是機器人（包天笑《新造人術》）等等，顯然是將一些先進的物質文明通過神奇的描述介紹給國人。在新文學登上文壇之前，中國文學有沒有白話文學，回答同樣是肯定的。這裏祇強調兩點：一是白話寫作本來就是小說這種文體所決定的。在中國文學中，話本是現代小說起源之一，大眾化是小說創作的主要動力，所以利用最淺顯的俗話進行創作理所當然。二是“鴛鴦蝴蝶

①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4（1918）：1。

② 蘇曼殊譯爲《慘世界》，原名《慘社會》，曾在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上海出版的《國民日報》上連載，署名法國大文豪譯俄著，中國蘇子般譯。

派”是最早主張運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的文學流派。1917年1月，包天笑主編的《小說畫報》創刊，在雜誌的《例言》中標明：“小說以白話為正宗，本雜誌全用白話取其雅俗共賞，凡閨秀學生商界工人無不咸宜。”同年同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也提出白話為正宗的主張。包天笑有這樣的見解，十分難得。《小說畫報》從第一期開始，全部是白話創作；而當時《新青年》還是文言寫作，其白話創作直到1918年5月魯迅的《狂人日記》纔開始。

當然，這些通俗文學作家所宣揚的“新國民”、“新科學”與“五四”新文學宣揚的“民主”、“科學”有着不同的內涵。“五四”新文學的“民主”，要求的是“人之民”。陳獨秀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中說得很明白，他所要求的“新國民”不是“國之民”，而是“今日競爭世界”之中具有“共同原則之精神”的“平等人權新信仰”。魯迅說得更明白：“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①至於“科學”，當然也不僅僅是那些先進的物質文明，而是具有科學思維的“科學主義”。“五四”新文學主張的白話創作與通俗文學作家主張的白話創作也有着區別：一是“五四”新文學是從科學主義的態度要建立一種“文學的國語”，而不是僅僅看中白話的世俗性、淺顯性加以利用，因此他們是用比較規範的白話寫作，而不是“說話”寫作。二是他們創建了白話詩。詩歌是中國傳統中最有規範的文體，雖然晚清的“新派詩”對中國詩歌中的一些規範作了調整，但總體上還是依照規範辦事。白話詩是徹底地解放了的詩體，自主、解放、創造的意識貫穿於文學創作之中，哪怕是最有規範性的中國詩歌領域也不例外。

現代通俗文學的啓蒙主義和白話寫作不同於“五四”新文學的啓蒙主義和白話寫作，但它們具有一致的改革創新的思維觀念。正是在這一點上，現代通俗文學與古代文學體現出更多的切割，而與“五四”新文學體現出更多的聯繫。所以，應該將晚清興起的現代通俗文學與“五四”時期興起的新文學看成一個整體，它們一起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期；又由於它們之間有着區別，因此應該將現代通俗文學的興起看成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初級階段，將“五四”新文學的興起看成是現代文學發生的高級階段。

其實，不僅是在改革創新的思維觀念上，一些文學現象的發生發展也無法將現代通俗文學與“五四”新文學斷裂開來。例如，魯迅在“五四”時期對社會批評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婦女問題和婚姻問題，《祝福》、《我之節烈觀》等小說和雜文產生的影響經久不衰。但魯迅的這些作品祇是代表着當時的一個層面，關於婦女問題和婚姻問題產生影響的小說在當時還有幾部：徐枕亞（1889—1937）的《玉梨魂》，吳雙熱（？—1934）的《孽冤鏡》，包天笑的《一縷麻》，李定夷（1890—1963）的《二十年苦守記》等。如果將這些作品結合起來考慮，至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1）通俗文學作家與新文學作家對社會轉型期的社會問題都進行了思考，儘管他們的結論並不相同。（2）這些文學作品都認為當下的婦女地位急需改善，當下的婚姻制度不合理，幾乎都是以悲劇告終。悲劇意識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標誌，它與喜劇的區別在於：喜劇總是給人希望，悲劇是對社會黑暗和不公的絕望和批判。（3）這些作品之間有着反襯、鋪墊和傳承的關係。魯迅的《祝福》、《我之節烈觀》不是飛來之石，祥林嫂等形象也不是突兀而起。這樣的作品和塑造的形象是當時討論婦女問題、婚姻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祇不過它們代表着新文學的一端。而魯迅的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夠產生重大影響，與其他作品的鋪墊有一定關係。不管是什麼態度，以悲劇告終的婦女婚姻小說總是讓人產生很多聯想，為什麼她們就不能婚姻自主？為什麼她們都要以死作為代價？其中有沒有文化社會問題呢？這些作品看多了，心中的疑問就累積多了，於是魯迅的文學作品發表之後就在知識分子中間產生更多的共鳴。因此，祇有將現代通俗文學與“五四”新文學作為一個有聯繫、有區別的整體看待，纔能對一些文學現象看得更為全面。

^①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第1卷，第44頁。

三 如何看待現代通俗文學的市場性和娛樂化？

在一些學者眼裏，通俗文學充斥着“文字泡沫”、“文字垃圾”，通俗文學作品的暢銷是大眾的“淺閱讀”。這種觀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於這些學者對通俗文學的創作機制、閱讀取向缺乏深入瞭解。

通俗文學本身是市場的文學，其發展一直是伴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前行的。中國通俗文學最爲強勁的發展時期是清末民初、1920—1930年代、1990年代至今，而這三個時期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比較強勁的時期。放眼世界通俗文學史，歐洲現代通俗文學起步於19世紀，伴隨着工業革命發展而來；美國的通俗文學被稱爲“美國學”，強勁發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通俗文學被稱爲大眾文學，是在1960年代後隨着經濟強勁發展而繁榮的。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於通俗文學的特性。首先，通俗文學作家都是職業作家，以寫作作爲謀生的手段。其次，通俗文學作家的創作過程完全依靠市場來運作。再次，作家作品的存活要依賴一個比較龐大的閱讀市場。正是市場給予了通俗文學的性質，市場同樣也需要通俗文學。當市場經濟成爲社會發展的主要取向時，人們並不單純地要求文學反映重大的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並不單純地要求文學扮演思想啓蒙書的角色，而是要求文學更多地表現出生活的快樂感和精神的愉悅感，要求文學成爲一種通俗的閱讀物。這個時期，文學也就與其他商品一樣，是一種消費品，祇不過它屬於精神領域中的消費品而已。這是通俗文學最根本的特徵。

由於市場化的要求，通俗文學容易“跟風”，“跟風”的結果就容易庸俗、媚俗，甚至對社會造成傷害，但這祇是市場化的一個側面，還應看到市場化給通俗小說創作帶來的多方面活力：

(1) 它給通俗文學創作帶來了敏感性。通俗文學作家既然依靠市場，當然就要關注市場的需求，因此，通俗文學作家對市場的熱點問題相當敏感，文學題材的時代感特別強烈。清末民初的“鴛鴦蝴蝶派”之所以熱衷於言情小說創作，1930年代末的通俗小說作家之所以寫那麼多的“抗戰小說”，1990年代初《北京人在紐約》之所以引發“域外小說”的創作熱，1990年代中期之後《蒼天在上》等“官場小說”之所以一哄而上，道理很簡單，婚姻問題、民族存亡問題、出國創業問題、腐敗問題都是當時人們所關心的社會熱點。不是說通俗文學作家對社會問題有多麼深刻的思考，而是說他們對時人所關注的問題有着特別的職業感悟力。

(2) 它給通俗文學帶來了激烈的競爭性。通俗文學完全是被市場的生存和市場的淘汰所左右，它的競爭性要比高雅文學殘酷得多，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俗文學的作家面廣量大，而且特別喜歡“扎堆”，一種類型的小說走紅了，就一起擠進去，但是真正被市場所關注的作家並不多，大多數都在競爭之中被淘汰了。二是通俗文學的創作取向喜歡追逐熱點，熱點就是當前市場所關注的對象。從通俗文學的創作實踐看，20世紀至今的通俗文學發展史，就是一個熱點接着一個熱點堆積而成。一個作家在前一個熱點是代表，並不意味着是下一個熱點的代表。不是通俗文學作家不努力，而是市場的熱點變換太快。這樣的競爭對作家來說是壓力，對讀者來說是福音——可以永遠看到新鮮話題的通俗文學作品。

(3) 它給通俗文學創作帶來了創新性。通俗文學的創作方法一直處於變動革新之中，主因是市場的壓力，讀者在督促着通俗文學作家時時創新，否則就不能走紅，就會失去生存的資本。市場化給通俗文學創作帶來了弊害，但積極因素大於消極因素。其實，任何一種性質的文學存在都有它的兩面性，高雅文學走向極端後，或者會晦澀，或者成爲時政的文學讀本，這在中國的高雅文學實踐中一直存在着。

通俗文學確實是在追求娛樂的最大化，沒有了娛樂性，通俗文學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屬性。這需要從兩個方面正確看待：一是追求娛樂是文學創作的本質特徵之一。祇有通過愉悅，文學纔能傳達出思想。文學作品追求娛樂的功能受到排斥，與20世紀以來中國主流文學強調的文學的主體意識有很大關係。20世紀的中國，是思想激烈交鋒和社會體制更替轉換的時代，中國文學的社會功能——啓蒙和宣傳被抬到了極高的位置，而愉悅功能則被遮蔽了。但是，用文學的社會

現實意義取代文學功能的歷史價值，並對文學價值的高低作出判斷，難免會失之偏頗。二是優秀的通俗文學從來都是以娛樂的表現方式反映出深刻的文化、社會和人生問題，優秀的通俗文學作家從來都是通過娛樂的故事情節思考問題，從而達到娛樂、思考俱佳的目的。例如，王度廬（1909—1977）在《臥虎藏龍》中塑造的玉嬌龍形象很為人們稱道，就在於她具有閨秀和俠女雙重性格——白天是閨秀，讀書刺繡；晚上做俠女，騎馬奔馳。前者尊崇禮法，後者個性張揚，最後是衝出家庭走向自己選擇的生活道路。這是王度廬的人生價值思考的結果，它符合1930年代新青年所要求的人生選擇。如果從新文學的角度追尋作者的創作靈感來源，就會發現，這樣的人物形象和生活道路的選擇在巴金的《家》中就有典型的演繹。王度廬是從寫新小說轉向為寫武俠小說的，他再用新小說中的文化價值來思考武俠人物。再如，很多人喜歡《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就因為這個形象在你爭我奪的江湖世界中張揚個性獨自逍遙。這正是金庸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紛亂的世界中人生態度的反思。用文化來構造情節、塑造人物、反思社會，帶給小說的不僅僅是深度和內涵，還有批判的力量。因為作家所秉持的文化總是充滿着自我解讀，而自我獨特的文化解讀總是不合潮流。特異於潮流，批判的力量也就蘊涵其中了。

四 建立符合現代通俗文學特色的批評標準

綜觀這些年來的通俗文學批評，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缺憾：一是以既有的概念和原則出發看待通俗文學，特別是用“五四”新文化批評“鴛鴦蝴蝶派”的理論來評論中國所有的通俗文學，並以“五四”新文化的捍衛者自居；二是批評者自身在沒有仔細閱讀通俗文學作品的同時，又擺出一副不屑一看的姿態。這兩種缺憾歸結為一點，就是脫離實際。他們並沒有真正理解“五四”新文化對“鴛鴦蝴蝶派”批評的必要性和歷史意義，沒有看到“五四”新文學為奪取中國文學正宗地位時所採用的那些矯枉過正做法的合理性；他們對中國現代通俗文學也缺乏發展的眼光和變動的思維，並不瞭解通俗文學的性質和當今中國通俗文學的實際狀態。針對這樣的通俗文學批評現狀，建立符合通俗文學特色的批評標準很有必要。

所謂文學批評的標準，有終結性與適用性之分。人性、人生的價值是文學批評的終結性標準，這是統一的。但是作為一個個體，作家的生活體驗和文學體驗又不可能是一種模式，它們一定是多樣的。作家多樣的創作狀態決定了文學批評不可能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決定了文學批評方式、原則、理論也一定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同樣是“五四”作家，葉聖陶（1894—1988）有着更多的中國傳統文學的體驗，其作品側重於現實主義；郁達夫（1896—1945）有着更多的日本文學體驗，其作品側重於浪漫主義，把葉聖陶的批評用於郁達夫身上就不合適。因此，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用不同的批評標準衡量，是文學批評能夠適用、有效的基本出發點。

建立現代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也是由通俗文學的審美機制所決定的。這樣的批評標準應當是對通俗文學所追求的文化價值、審美機制、創作方式能夠理解，而不是用高雅文學所要求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來要求之。例如，通俗文學創作有兩個特徵一直受到論者的批評，一個是小說的虛擬性情節構思，一個是模式化的寫作方式。如果用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分析這兩個創作特徵，就可以作出合理的解讀。從虛擬性情節構思來說，通俗文學中的武俠小說不是現實主義，而是大眾文化形態的產物——它不追求環境的真實性，而追求環境的奇異性；不追求人物形象塑造中細節的合理性，而是在誇張的人物的行為舉止中表現出人文精神；它不追求創作風格的冷靜和客觀，而是追求想像力的豐富和色彩的瑰麗。從這樣的思路出發，武俠小說所寫的那些奇景、奇境就有了合理的解釋，武俠人物很多怪異的行為就能引來欣賞的目光，就會對武俠小說的想像力有一種平常的心態。從模式化的寫作方式來說，通俗文學的創作模式基本上是中國傳統文學的延續。小說結構基本上是章回體（即使金庸的小說在回目上作了很大變動，小說的基本結構還是章回體）。章回體小說就是要講故事，所謂故事就是有頭有尾的人和事的描述。在通俗小說的故事敘述中，偶然往往構成故

事的開端，突變往往構成故事的曲折，崇高往往構成故事的結局。由於不同的題材有着不同的表現手段，通俗小說也就形成了一整套的程式化的創作技巧。例如，言情小說“三部曲”——純情、變情、絕情；武俠小說“五要素”——爭霸、奪寶、情變、行俠、復仇；偵探小說“三程式”——設謎、解謎、說謎；歷史小說“兩綫索”——權力與情欲等等，這些創作技巧構成了各類通俗小說的模式。對高雅文學來說，模式就是因循守舊，缺乏獨創性；但對通俗文學來說，模式本身就是特色，否定了其中的某一類實際上就否定了某一類通俗小說，乃至於否定了整個的通俗文學。現代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不是要否定這些模式，而是追尋這些模式化的寫作方式中的價值：模式的組合之中本身就充滿了愉悅性和創造性。這些模式與大眾的認知水平相一致，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的意見，讀者都有能力並有可能在參與性的文學想像中產生精神愉悅。這些模式還能夠滿足於人性的基本慾望，它與人的好奇心（對身外的事情產生興趣）、窺私慾（想瞭解別人那些隱秘的事情）、破壞慾（想有一個情緒發洩的對象）、佔有慾（獲取更多精神和物質財富）、情慾（自然慾望）等基本慾望緊密相連。這些模式其實就是根據人的基本慾望創作、沉澱而形成的固定程序。對這些模式的閱讀也許不能引起多少人生哲理的思考和人生價值的啟發，但一定會產生閱讀的快感，閱讀者的焦慮、緊張的現實情緒會得到鬆弛。祇要人類這些基本慾望一直生生不息、轉換多變的存在，通俗小說的模式也就會生生不息、轉換多變地延綿。從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中，人們不但能看到通俗文學的模式和複製的合理存在，還能對這些模式和複製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現代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並不是一種“淺批評”，而是結合通俗文學的文學特徵建立起來的批評標準。它要求作家依據通俗文學的創作規律對文化、社會、人生進行深入思考，並以此來評判作品的優劣好壞。這是一種有其特色的批評標準。由於通俗文學繼承的是中國傳統文化，這一既定的做人標準使得個性的張揚受到了束縛，個性受到束縛下的作品就生動不起來，因此，如何使傳統文化的宣揚與人的個性融合，如何既保持文化傳統又能讓作品生動起來，是通俗文學作家一直努力的創作目標。這個問題在張恨水的小說中已有改觀，但真正得到解決的還是當代通俗小說作家，而且是武俠小說作家。梁羽生（1924—2009）、古龍（1938—1985）各有貢獻，做得最好的是金庸。很多論家都提出，金庸小說依據一種“成長模式”來寫人，即以人物的成長作為小說的創作中心。我想要補充的是，金庸小說的“成長模式”中更具獨特價值的還不是他們表現各異的性格，也不是他們因不同的“機緣”而獲得絕世武功，而是性格各異的人如何達到了自我道德的完善。寫人物、寫性格祇是他的“成長模式”的顯性綫索，寫道德完善纔是他的“成長模式”的深層結構。金庸小說告訴人們，中國傳統文化是否束縛人的價值實現，關鍵是如何看待人的價值的內涵。如果將人的價值的實現看成是完全解除一切束縛的個性的自我實現，中國傳統文化顯然是格格不入；如果將人的價值的實現看成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中國傳統文化就是最好的標準。在金庸小說中，人的道德的完善並不抹殺人物的個性，相反，它使人的個性得到更合理的張揚；人的道德的完善並不是不要人的慾望，而是使人的慾望更富有理性。如果把人的生命的闡釋、個性的追求、孤獨的情緒、離別的傷感等觀念和情緒看作是現代意識的話，金庸小說同樣表現得淋漓盡致。祇不過，金庸並沒有將這些觀念和情緒與傳統道德文化割裂開來，而是作為傳統道德文化的一個部分加以表現。金庸小說的意義不僅是對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價值的提升，也是為當代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創作樹立了一個標杆。從傳統文學與“人的文學”相融合的角度論證通俗文學創作的高低優劣，從高雅文學的批評標準來看也許並不重要，但是從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來看就是一個重要的指標。諸如此類，就是通俗文學批評標準的特色。

〔編者註：該文係作者承擔的中國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評估價值體系建構與文獻資料整理”（12BZW107）、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通俗文學價值評估、閱讀調查及資料庫建設”（13&ZD120）的階段性成果。〕